

核心话题

社保有必要实行费改税吗？

近日，中国健康养老集团董事长朱跃在《学习时报》刊文，建议“健全现代化养老机制，建立基础养老金费改税制度”，他提出借鉴国际上通行做法，结合我国目前养老保障、养老金的现状，开征社会保障税，并在此税目下设置养老税，对纳入社会统筹基金的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改征为社会养老保险税（养老税）。

文/梁发蕾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社保的税率很高。雇主缴纳的工薪税率最高可达支付给雇员工资的30%，而雇员则按3.95%利率缴纳，且每年不超过1.0576万瑞典克朗。在澳大利亚，工薪税的纳税人是雇主，税率由各州自行决定。

到底应该征收社会保险税还是社会保险费，近些年人们一直在争论。有些人从税收与费用的本质区别着眼，进行论证，来支持自己的主张。税收是一种没有对价的强制而无偿的征收，而费用则是有对价的有偿的费用。因此，支持社会保险费的人们指出，这项收费实际上是专款专用，未来还要偿还个人，因而应该是一种有偿的收费，而不

应该是无偿的税收。而支持社保的人则认为，社会保险的收入，有强烈的再分配性质，对于个人来说，他自己以及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金将来并非全部如数返还个人，实际上被强烈地再分配了，它不是完全有偿的；再说社保也是强制参加的，费用也是强制征收的，所以它符合无偿和强制这两个税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税收，应该实行社保税而不是社保费。

这样的争论各有道理，因为无论叫做社保税还是社保费，它确实具有一些特殊性，既不像典型的税，也不像典型的费，是一种介于税收和费用之间的过渡品种。它很像是一种费用，会根据供款人的实际出资，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与个人和用人单位缴纳的总量挂钩，不能完全认为是无偿的，尤其中国社保的个人账户部分，未来退休时可以领取，本人去世后还可以由遗嘱继承。这些特点都是费的特点而不是税的特点。但是，社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不是自愿性的保险，而且，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统筹部分显然与个人未来的领取额度并不严格挂

钩对等，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性质，虽然从国家的大盘子来说，这些资金是专款专用，不能用于其他非社保的项目，但是，在社保内部，这些资金完全是再分配性质的。一个参保人如果不幸早逝，他的雇主缴纳的费用就与他毫无关系了。所以，它又很像是一种税收。

我国是否像国际通行那样实行社会保险税，已经争论了好长时间。我国城镇职工社保实行统账结合制度，单位缴纳的进入社会统筹账户而个人缴纳的进入个人账户，这种制度也是现收现付与个人积累相结合的制度。因此，社保费改税必然涉及对个人缴纳部分和用人单位缴纳部分如何处理的问题。由此有的人提出将个人缴纳部分实行费改税，有人提出将统筹部分费改税，当然，也有人提出将个人和单位缴纳一律实行费改税。这次朱跃的建议，是将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实行费改税，个人账户部分仍然不变。

从中国社保的实际情况看，朱跃的建议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我国的统账结合的养老保

险制度下，用人单位缴纳的统筹部分用于再分配，现收现付，这部分本来和税收非常接近，将它改为税收，不存在太大的理论上的障碍。而个人账户要调动个人缴费积极性，就不宜搞再分配，而应该根据个人缴纳和积累的多少，由个人最终使用，这就不宜实行费改税，应该继续保留费的特点。

那么，对用人单位负担的统筹部分实行费改税，有什么必要？有什么难点？

社保费改为社保税，其强制性必然会大为增强。虽然社保费本身是强制性的，但是作为一项费用，其征收的强制力度显然不能与税收相比。逃费可能违法，但不构成犯罪，而逃税就可能面临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处理。显然，实行费改税，强制性可能会带来参保覆盖面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另外，虽然社保费专款专用，但既然是一种税收，未来如出现支付缺口，国家财政就必然要最终兜底，国家的支付责任应更加强化。而费改税，全国统筹管理，则为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制度提供某种契机。

改革的难点在于，既然是一项税收，那么，目前这种碎片化的管理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全国统筹才能全国一盘棋地征收社保税。另外，社保税可能增加企业经营压力，必然受到反弹。目前我国单位负担的养老保险费的费率已经从20%下调到16%，但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这个费率仍然是相当高的。如果实行费改税，随着征管力度的加强和征管技术的提高，征收率将会大为提高，逃税将会更为困难。今年年初，本来按照规划，社保费由税务部门征收，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决定按照名义费率重新核定用人单位的社保缴费额度，并追缴企业的社保欠费，这些打算引起极大恐慌，最后不得不搁置。实行费改税，如果不继续下调企业的税率，那么，在严监管之下，很多企业可能仍然是不堪重负的。

在目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可以进行讨论，广泛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如确有必要，则可以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启动立法程序，以法律形式确立它。

国际观察

多元主义在欧洲失败了吗？

多元主义在欧洲是不是正在失败？从英国脱欧到现在，欧盟面临的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挑战来看，多元主义在欧洲遇到了极大的困境。不断涌入的难民和移民冲击着欧洲近代二三百年来形成的主权国家的堤坝，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世俗国家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冲击，欧洲伴随着欧盟扩张而不断扩张的时候，文化意义上的欧洲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寻根，寻找和强调欧洲的文化之根。从“二战”结束之后，欧洲盛行一时的多元主义进入了一个拐点，文化、宗教、族群的边界越来越“强硬”，身份政治意外归来。国家不仅是政治治理的单位，也是文化身份认同的纽带，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没有消弭多元主义的隔阂。

文/孙兴杰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北大汇丰海上丝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等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本土声音的政党，这种政治思潮反弹背后的根本动力在于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着尖锐的挑战，那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权力框架难以整合与容纳多元文化。其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冷战后的历史就能发现，对多元主义发出警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为难民打开大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了。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也表达过类

似的观点，多元主义与“大熔炉”并不一样，多元主义假定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可以多样性共存与发展，也就是说，多元既是现实，也是目标，这与美国早期实行的“大熔炉”政策是不一样的，“大熔炉”还是要把不断涌入的移民锻造为美国人。

多元主义的基础是共同的文化认同，其实在欧洲历史上，共同的基督教背景并没有保证多元共存，教派之间的冲突不亚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宗教改革的时代，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战争非常惨烈，“三十年战争”之后，不同的教派之间才不得不接受了共存，宗教引发的战争逐渐减少，教派之间的矛盾不再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宗教战争的结束以及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让欧洲建立起来了世俗国家的制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成为欧洲发展注入了动力，阶级或者阶层变成了政治分析的主要的单位，以财富的多寡而不是文化与宗教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此，多元主义获得了共同的基础和纽带。

“二战”结束之后，大规模的移民，尤其是曾经殖民地国家向宗主国的移民，改变了欧洲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城市的族群构成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德国科隆、法兰克福，英国伦敦、曼彻斯特，法国巴黎等欧洲大城市人口中穆斯林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0%。曾经有一篇研究社会群体对主流文化影响的论文，其中的结论非常令人震惊：一个社区或者社会中，具有内聚力的群体的人口占比超过10%的话，这个社区的主流文化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穆斯林人口占比超过20%，多元主义的前提和假定带来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半个世纪之前也问过：“在一个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可参与选举但知识、财富、社会地位、担任政府官职的机会，以及其他资源的分配都不平等的政治系统中，到底谁在进行统治？”欧洲文化和族群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来，选举也是一种政治

动员的方式，而选举政治背后的政策选择也关系到不同的群体的利益分配。

罗伯特·达尔在《谁统治》一书中对组黑文的“长时段”研究表明，种族身份在这个城市政治演进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意大利(裔)人、爱尔兰(裔)人与德国(裔)人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最终实现“大熔炉”。欧洲的多元主义没有实现政治整合的目标，族群政治在兴起。从长时段来看，可能欧洲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欧洲国家不得不将不同宗教、族群纳入到政治的视野之中，毫无疑问，基于共同文化背景建立的欧洲国家的基本架构还不能适应这样的政治现实。你可以说，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强国为什么能够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现在却不能在欧洲本土解决多元文化的现实？这个问题抓住了要害，在殖民帝国时期，多元性是建立在等级性之上，而“二战”之后随着普选权的推广，国家政治越来越需要建立在均质化的公民身份之上。

欧洲面临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多元主义怎么能够产生具有共识的公民身份？就像罗伯特·达尔所说的，“种族认同的意识并不是产自政治家；而是由整个社会系统创造的。种族相似性是一个可感知的现实，内含在从早期提提时代到耄耋老人的种族意识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共同的、透明的空间之中，但是人类在99.9%的时间中是生活在小型共同体之中。这是多元主义面临的坚硬的身份边界。

欧洲兴起的排外主义本身也是对多元主义的反弹，我们还不能说多元主义在欧洲已经失败，但是，至少它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甚至是萎缩的时期。欧洲人也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欧洲是谁的欧洲，或者说，谁是欧洲人？有人说，欧洲国家的足球队成员已经多元主义了，比如法国国家队。但这并不代表国家政治也必须多元主义。法国既然有一支非洲军团一样的国家足球队，就不得不面对国家政治的多元主义挑战。

解读金融

美联储的“独立性”意味着什么

近日，美联储四位前主席沃尔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联合发表署名文章，向公众呼吁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强调美联储不受制于短期的政治压力影响，必须独立行动，服务于经济的最大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公开批评了美联储量化紧缩政策，要求美联储更大幅、更快下调利率。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的矛盾由来已久，随着美国大选逐渐临近，美联储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政策分歧加大，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美联储是否还能坚守其“独立性”，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文/骆振心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

少的硬件，同样，美联储的“独立性”确保了美元的币值稳定，保持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是美元承担起“世界货币”不可或缺的软件，这两者在美元发挥“世界货币”的作用中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得美联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超级央行”的角色，美联储成为全球货币政策的主导者，美联储的政策成为世界各国央行的风向标，美国也在通过美元的全球扩张而获得了好处。

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确保其货币政策“正确性”的重要前提。

独立的美联储可以确保货币政策不为政治集团利益所绑架，着眼经济的长远发展来实施正确的政策，而不是在短期内刺激经济来迎合选民。美联储的“独立性”有着三个方面的重要支撑。一是理论信念。货币主义对货币数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研究得出结论，货币只是一层面纱，货币扩张对经济长期增长没有太大作用，只会导致物价上涨。这一理论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共识。二是机制保障。美联储理事会作为美联储的最高决策机构，美国《联邦储备法案》规定包括美联储主席、副主席在内的7名理事会成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每一名理事的任期是14年，各理事成员任期错开，间隔两年。由于理事的任期与总统任期不同，每任总统只能就空缺的理事提名，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总统干预的权力。三是良好传统。美联储第十二任主席沃尔克上台后，面对两位数的通胀率，坚持货币紧缩，多次拒绝

里根总统关于放松货币政策的请求，治愈了长期困扰的通胀问题。格林斯潘任期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没有迎合老布什竞选连任的需要而下调利率。美联储顶住政治压力实施其认为正确的政策为美联储赢得了声誉，公众也意识到美联储独立对经济长期增

长的益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联储理事会成员辞职和空缺人数增加，使得特朗普在其任期内有权力提名5名委员，这意味着其有超乎以往的权力来重塑美联储，把政府的政策意志强加给美联储，美联储面临丧失“独立性”的境地。

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丧失，其世界金融体系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一是全球货币竞争的局面将加剧。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资产的份额占到60%左右，大大低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70%以上的水平。

下转 E4

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多措并举开展打击传销宣传工作

积极加强与街道、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和协作，重点对辖区内有形市场、大型商超及写字楼进行线索摸排。

一是全面宣传，营造高压态势。在人流密集的市场、社区、广场张贴宣传海报，公开举报方式，利用电子显示屏、举报信箱、微信公众号推广、微信经营户群，多渠道、全方位开展“打击传销”宣传工作。

二是积极引导，形成社会共

治。组织市场经营商户召开打击传销专项工作宣导会；执法人员逐户走访，向经营者和消费者派发宣传单；印制“打击传销”举报方式小标签，畅通商户和消费者举报传销行为的渠道。

三是重点摸排，严查严打。重点检查直销企业网点，检查其经营行为、经营方式，对其培训行为进行监管，采取针对性措施，严查严打。

四是各部门通力合作，形成

打传网络。对易滋生传销行为的重点区域、行业、领域重点加强日常监管，会同公安机关健全和落实市场准入、规范管理、重点监控等机制，消除传销势力滋生土壤。



红盾之窗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专栏